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全国人大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吴邦国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受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吴邦国委员长向大会报告工作。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就座。吴邦国强调,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走群众路线,从人民的实践创造中汲取智慧,从人民的发展要求中获得动力,努力使人大各项工作更好地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贴近民生,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如期形成

吴邦国在报告中说,到2010年底,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统一。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各方面长期

共同努力,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有法可依。

制定修改系列环境类法规

吴邦国指出,常委会在每年听取审议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同时,专门安排听取审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十一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以及服务业等报告,检查科技进步法实施情况,修改专利法等。

针对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严峻挑战,常委会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修改可再生能源法、水土保持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听取审议环境保护、水污染防治、土地和矿产资源管理等报告,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从法律层面和工作层面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吴邦国强调,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根本。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体现我国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我们深刻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征,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特色、发挥自己

的优势,不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充分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理论影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我们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认真办理代表议案和建议

吴邦国说,今年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原则通过,对今年的工作作出预安排。

一是抓紧研究制定五年立法规划;二是听取审议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城镇化建设、反贪污贿赂等报告等法律实施情况;三是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认真办理代表议案和建议。

曹刚(综合新华社)

预算编制要看得明白弄得清楚

上海代表团审议预算报告后提出建议 韩正杨雄殷一璀出席

上海代表团7日、8日分别举行小组会议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韩正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代表,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上海代表团团长殷一璀代表参加审议。

新代表如何从预算报告中看明白“换届年”预算情况?三公经费到底是“分散表达”还是“集中展示”?财政转移支付如何支持“美丽乡村”建

设?昨天审议预算报告时,从预算报告形式到预算编制内容,代表们提出了意见。

5年预算 新代表需要看见“全貌”

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年,就是两届人大的“交接年”,也是上届5年的“总结年”,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预算报告,其中的预算执行信息,怎样才能让“初来乍到”的新代表看得清楚?

“预算报告不止需要展示本年度的预算收入

和执行,也要报告过去5年的预算执行,内容不必太细,但要有大类说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林是一位新代表,他说,新代表只有了解预算的连续性,才能更准确地审议“开局之年”的预算。

三公经费 集中说明有利于监督

三公经费,无疑是代表们最关心的。今年的预算报告中,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分布在各个部门

的预算当中。“预算稳定资金,就像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三公经费没有集中,零零落地散放在部门预算当中,就算我是专业人士,也看不明白。”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说,如果集中单独说明,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明白“晒三公”,更有利于人大预算监督。

“美丽乡村” 要自强也要财政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孙跃明说,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美丽乡村”要发展,既要保护生态,还不能减少农田,“既要自强不息,也要财政支持,转移支付反哺新农村,预算编制科学点,蛮好。”孙跃明说。

特派记者 姚丽萍 邵宁 马亚宁

(上接第1版)

问:有没有想过,少淘汰些项目以保经济总量?

杨:落后产能所产生的GDP其实是没有质量、没有效益的。不能只为了GDP,把一些产业硬留下来。我们不能被GDP牵着鼻子走。

问:纽约、东京等城市在转型中都曾出现过经济大幅下滑、就业压力、财政危机等连锁反应,上海能避免“转型陷阱”吗?

杨:避免“转型陷阱”的关键是在转型发展中把握好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去年上海尽管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转型发展持续取得新进展,突出表现在“三个领先增长”和“四个减少依赖”上,即:三产领先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6%;外资领先增长,实到外资预计同比增长20.5%;居民收入领先增长,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1%左右,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略高于经济增幅。同时,对投资拉动依赖减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70%以上;对房地产业依赖减少,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从2007年的7.7%下降到5.4%;对重化工业依赖减少,高耗能行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从2007年的42.5%下降到24%左右;对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依赖减少,一般加工制造业加快向外转移。这种平缓的、渐进式的调整,符合我们期望。

问:国务院文件指出,到2020年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距离这个时间表还剩7年,如何突破?

杨:两个中心建设是国家战略,这几年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还面临不少困难。比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要把人民币产品的创新、交易、定价、清算功能尽快建立起来。

航运中心建设有两个基本点:集

疏运体系和航运服务体系。我们的短板在航运服务业发展还不够充分。对此,“营改增”是一个促进。最近,国家又给了政策,凡涉及到国际航运的,营业税是零。这样就能和国际同行处于相同税负条件下公平竞争。

改革:最高境界就是在不知不觉中体制机制已调整

“上海已经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对此,上海领导层反复自省。改革图新成了上海的最热词。

问:“没有改革创新就无法前进”,对上海而言,这是现实还是忧患?

杨:上海对改革创新是有自觉的,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改革创新举措都在全国领风气之先。上海现在的转型是历史上一次比较大的转型。过去的部分体制机制、管理措施,存在不适应新的发展态势的情况。我们希望通过改革,使上海经济更有活力、动力更足。上海要继续按照中央要求,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科学发展先行者。

问:“改革已到深水区”,上海今年将有哪些“深水突破”?

杨:首先还是深入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今年可能会有一些大的举措;其次是深化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适时把邮电通信、铁路运输、建筑安装等行业纳入,进一步释放试点效应。另外,还将下大力气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加强对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的扶持。同时,还将加大力度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改革越深入,越需要智慧。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谋定而动,使改革更有实效。看上去我们没有过多的口号和宣传,实际上我们没有停步,力度比以前还大。

问:“于无声处听惊雷”?

杨:改革最高的境界,就是不知不

觉当中,你已经把它改好了,体制机制已经调整了。当然,这个境界很难。我们还是一步一步把工作做得更细、更深入,同时把改革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理政:政府心中要有法,转型要带头

十八届二中全会提出,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社分开,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在人们的印象中,上海是“强政府、弱社会”。

问:某种意义上,“强政府”是上海的标签,您在多种场合提到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二者有联系吗?

杨:人们说“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小一点是对的,但小不等于弱,小也要强。政府要强,自身就要过硬。我们一直高度重视政府自身建设。首先是审批制度改革,这几年审批事项减少了一千多项。第二是依法行政,政府心中要有法,要知道你的职权范围是法律规定的,不能越权越位。这个问题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第三是提高效率,简化程序,把一些繁文缛节去掉。我们项目审批效率因此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潜力很大。

问:新一届政府想展现一个怎样的上海?

杨:上海的城市精神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价值取向是“公正、包容、责任、诚信”。其所揭示的形象就是我们的追求。历届上海市政府领导班子都认为,在地方政府管理水平上,上海不但要在全国追求卓越,在全世界也要力争排在前列。

管理:治大城如烹小鲜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吸引八方来客。常住人口接近2400万,其中非户籍人口占2/5,上海在寻求承载力与“融城梦”之间的平衡。

问:外来人员想融入上海,享受均

等公共服务,比如对异地高考等诉求强烈,上海如何解决?

杨:上海历史上就是一座移民城市,目前老龄化率达到25%,也需要外来人口补充。一方面,要按国家要求,严控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另一方面,要善待外来人员。我们将坚持“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居住”的取向,完善居住证管理制度,重点是建立健全居住证与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对应挂钩、梯度化的制度,改善来沪人员基本公共服务。

去年底,我们以《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为依据,出台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沪参加升学考试的有关方案,一是父母符合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规定的基本要求并达到一定积分的,其子女可在上海参加中高考;二是父母符合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规定的基本要求,其子女可在上海考中职,读完中职后可在上海考高职高专,读完高职高专后可参加专升本考试。

问:面对雾霾,“美丽上海”怎么实现?

杨:上海有一个三年环保行动计划,现在进行到第五轮。每一轮投入五六百亿,甚至七八百亿。以前侧重于治“水”,比如苏州河的综合治理,今后会加大大气治理。我们将根据目前已知的雾霾形成原因,出台相应的治理措施: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强化机动车排放控制,全面推进燃煤污染治理,加强挥发性有机物防治,加大扬尘控制力度等。此外,还将加强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力争用若干年时间,使上海全面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诚信:不单是道德层面的东西,更要靠制度层面的安排

国际化大都市大多是信用完善的城市,诚信、契约精神一向为人乐道的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问:上海根据信用信息把生产型企业分成ABCD四级。在您眼中,“诚信上海”应该是什么样子?

杨:当诚信上升到体系建设,就要具体到对不诚信受罚、诚信受激励的制度安排。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在经济活动当中有不诚信的行为就要留下记录,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整理成信用报告,在办很多事时要提供给相对方查询。这样,对不诚信的惩罚会形成制度案本。我们希望政府部门首先使用信用管理。这对社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心声:“我和这个城市同呼吸共命运”

生于上海、长于上海,59岁的杨雄除了在西双版纳插队8年和外出求学外,一直工作在上海,直至走上上海市长的岗位。

问:从1985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毕业至今,您一直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有一种什么感情?

杨: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中间插队当知青,1977年考大学,然后又读研究生,再回到上海。我和这个城市同呼吸共命运。我们这一代人比较苦,像我比较幸运,我的很多同辈人——小学同学、云南知青,回城后工作都很艰苦。我觉得有责任把这个城市建设好、管理好,让市民能够不断地改善生活状况。我既是建设者,今后老了,也是这个城市发展成果的享受者。

问:希望上海市民若干年后对您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杨:作为市长,首先是市民;今后不做市长,就是一个普通市民。图名也是一种私心,会妨碍你的公正思维和决策。现在就是认认真真把眼前的工作做好,在任期里面能够扎扎实实为上海人民,为国家多干一些实事。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